

从“龙泉天下”到“天下龙泉” ——元明时期龙泉窑对外输出方式的变革^{*}

From Products Export to Technology Export:
The Reform of the Export Mode of Longquan Kilns 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沈岳明

Shen Yueming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内容提要: 龙泉窑在北宋时期便已展开外销, 并在南宋时期得到蓬勃发展, 但其外销产品与内销产品并无区别。从元代开始, 龙泉窑开始有意识地根据海外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偏好和民俗习惯来生产瓷器, 对海外市场进行了全方位的输出, 形成了“龙泉天下”的总体流布格局。到了明初, 由于实行海禁政策, 龙泉窑瓷器的生产和销售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部分当地窑场和窑工为了生计, 慢慢将生产转移到了当时管控较松的粤东、闽南地区; 同时, 类似的技术输出还存在于东亚、东南亚, 甚至远至西亚的伊朗、叙利亚及北非的埃及等地。总体来看, 明时期的龙泉窑有产品输出, 但更多的还是技术输出, 形成了“天下龙泉”的大势。从元代龙泉窑产品的一统天下, 到明代全球仿烧龙泉窑风格产品的风行, 既可以看出龙泉窑自身的魅力, 也可看出其输出形式从产品输出向技术输出的转变。

关键词: 龙泉窑 元明时期 产品输出 技术输出

Abstract: Longquan kilns were sold abroa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developed vigorously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t that time, however,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export products and domestic products. Beginning in the Yuan Dynasty, Longquan kilns began to consciously produce porcelain according to the living preferences and folk customs of people in different regions overseas and implemented a full range of exports to overseas markets, so that the overall pattern of “The World of Longquan” has been formed. To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Longquan kiln porcelain were greatly affected du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itime trade prohibition policy. Nevertheless, in order to make a living, some local kilns and kiln workers gradually moved their production to eastern Guangdong and southern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龙泉窑考古学研究”(项目批准号: 19ZDA230)的阶段性成果。

Fujian, which were relatively loosely controlled at the time. Simultaneously, similar technology exports still exist in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even as far as Iran and Syria in West Asia, Egypt in North Africa and other places. On the whole, in addition to the export of products, the Longquan kilns was also involved more technology exports in the Ming Dynasty, thus forming the general trend of “Longquan of the World”. Obviously, From the dominance of Longquan kiln products in the Yuan Dynasty to the popularity of imitation Longquan kiln-style product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we can see the charm of Longquan kiln itself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ort form from products export to technology export.

Key Words: Longquan kilns;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products export; technology export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生产规模最大的著名窑场，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对外输出产品及窑业技术最多的古代窑场。龙泉窑青瓷的大量外销，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对世界文明更是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龙泉窑之所以能够在宋元时期从一个产品只供应周边地区的地方小窑，迅速发展成一个窑场众多、遍布整个瓯江流域的庞大窑区，除了得益于自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及不断提高的制瓷技术，海上贸易发展中的深度介入，产品被大量销往海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数十年来，陶瓷之路经过的古代遗址及古代沉船中，都发现了不少龙泉青瓷，通过对这些考古资料的梳理，可以看出龙泉窑产品的外销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

一、龙泉始行：宋代龙泉窑的外销之路

北宋时期，尚处于发展初期的龙泉窑便已展开外销，尽管数量不多，但在东亚的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的菲律宾、苏门答腊北部、泰国班萨拉恩攀等地都有发现，不过产品相对单一。

宋室南迁以后，国土日蹙而养兵日多，庞大的开支迫使南宋政权不得不在经济上更为倚重海上贸易。《宋会要辑稿》载，宋高宗于绍兴七年（1137年）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绍兴十六年又说：“市舶

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1]丝绸、茶叶和瓷器作为中国古代最大宗的贸易产品，风靡海内外市场，而瓷器除了具有“市舶之利”的属性外，还涉及国家贸易政策。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2]。在两浙、福建、广南等路中，海商数量众多，龙泉窑核心产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成熟的生产工艺、上乘的产品质量等优势，当之无愧成为最适合海上贸易的船货，既达到了“市舶之利”的目的，又破解了金银“泄之远夷”之困局，所以此时的龙泉窑瓷器开始大量外销。与此同时，南宋政府鼓励瓷器出口的政策，也直接促进了龙泉窑的蓬勃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南宋时期的龙泉窑在窑址数量上有较明显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各方需求，其在质量上精益求精，改进胎釉配方，融汇官民、南北窑业技术，烧造出了为后世称颂的粉青和梅子青产品，可谓青瓷烧造的顶峰。

此时的龙泉窑瓷器较多地销往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在东南亚地区也有发现。如在印尼爪哇海域发现的12世纪的惹巴拉沉船（Jepara Wreck），就出水了一定数量的龙泉窑瓷器^[3]。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南宋后期开始，龙泉窑产品的对外输出已经突破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开始大规模地输往中东和非洲地区，扩大了销售区域和用户人群，其文化圈层也从北宋时期的儒家文化圈扩展到了伊斯兰文

化圈。南宋后期赵汝适《诸蕃志》中提到瓷器外销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越南、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坦桑尼亚等地^[4]。在对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在相当于南宋中后期的阿尤布王朝时期地层中，龙泉窑瓷片有较大量的出土，主持发掘的斯坎伦（George T. Scanlon）称之为“象洪水一般涌入埃及”^[5]。

虽然南宋时期是龙泉窑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龙泉窑风格的形成时期，其外销数量开始增多，销售区域随之扩大，但直到此时龙泉窑仍没有专门生产针对海外市场的外销瓷，其外销产品与内销产品相差无几。

二、龙泉天下：元代龙泉窑的产品输出

一直到元代，龙泉窑才真正全方位地拉开了外销序幕。元朝虽数次禁商泛海，但每次海禁持续时间都不长。总体看来，元朝政府推行了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立朝不久即沿袭宋制，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泉州设立元朝第一个市舶司^[6]；第二年又在庆元（明州）设立了提举庆元市舶使司；紧接着在上海、澈浦、广州、温州、杭州等增设了市舶司：“依例断没。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杂禁，凡二十二条，条多不能尽载，择其要者录焉。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市舶司凡七所，独泉州于抽分之外，又取三十分之一以为税。”贸易方式为：“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7]元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高度重视，为中国瓷器大量外销开辟了广大的海外市场，刺激了制瓷业特别是沿海地区制瓷业的发展。由此，中国历史上迎来了外销陶瓷贸易的又一个高峰。而从上述市舶司的设立情况看，元朝的市舶司多位于浙江地区，这应与龙泉窑产品的外销有着某种联系。

与宋代龙泉窑外销产品和内销产品相似不同，从元代开始，龙泉窑有意识地根据海外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偏好来生产定制瓷器，就是说需求

方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规格标准，龙泉窑按要求生产。也是从这时开始，我国许多窑场包括龙泉窑为了适应西方市场的需要，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从而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外销瓷。如龙泉窑产品中行销到中东地区形体硕大的盘、碗，流行于东南亚地区小巧玲珑的罐、瓶类产品等。前者是为了适应中东地区多人围坐就餐的习俗，后者主要用于随葬。这表明龙泉窑当时已经进入了为使用地生产定制瓷器的阶段，从普通的内销产品中选择部分器物进行外销转变为根据海外商家要求定制器物，当然会获得更大的利润，同时生产者也要承担更多的风险，所以这也是海上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元代龙泉窑也适时地成为当时输出瓷器数量最多的一个窑场，在瓷器外销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从全球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龙泉青瓷在这一时期对海外市场进行了全方位的输出。从东亚到南亚、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沿线都发现大量且占绝对数量优势的龙泉窑产品^[8]。根据对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沿线的一些重要古代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调查发现，在环印度洋地区，元代中后期到明初的龙泉窑瓷器在出土的中国瓷器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0%以上，而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所占比例在60%以上，是外销瓷中最重要的产品。

由此可见，至少元代中晚期到明代早期的龙泉窑在中国外销瓷中已经是“一统天下”，形成了“龙泉天下”的总体流布格局。

当年龙泉窑外销的盛况，从汪大渊《岛夷志略》即可看到。其书交易瓷器的诸条中，明确提到以“处州磁器”“青白处州磁器”“处州磁”“处器”“处瓷”“处瓷器”“青处器”等博买的地区有琉球（今日本冲绳）、无枝拔（今马六甲）、麻里鲁（今菲律宾马尼拉或波利略）、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或专指和乐岛）、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龙牙门（今新加坡南岸偏西之海峡石叻门，今名克佩尔港）、花面（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等二十处，统称瓷器或粗碗的有彭坑、班卒、嘯嘯、灵山、淡洋、千里马共六处^[9]。此外，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欲得唐货”条中

也记载：“其次如真州之锡罐、温州之漆盘、泉处之青瓷器。”^[10]除了上述二书记载的东南亚地区外，元代时输往西亚、中东乃至东非地区的龙泉窑产品也比较多，部分器物的质量相当高，这或许与带有官方性质有关。

元朝时期，龙泉窑瓷器还大量销往日本。尽管元朝与日本之间没有建立官方交往，但两国间的民间贸易却很频繁。不过，多是日本商人来华贸易的单向贸易。据《元史》等文献记载，元日间有明确记载的商船往来即达110次。日本考古出土资料表明，13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陶瓷在日本呈现猛增之势，而在13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中叶，龙泉窑青瓷占据主流地位。

14世纪上半叶，日本北条氏和金泽氏等权势贵族援助镰仓等地寺院的营建，为筹集建设资金，向元朝派出贸易商船，这是受镰仓幕府保护、半官方性质的贸易船。日本足利幕府的天龙寺采购了大量的龙泉青瓷船往日本，被认为是级别最高的“唐物”，深受喜爱，故在日本又被称为“天龙寺青瓷”^[11]。韩国发现的新安沉船就是航向日本的贸易船只，出水文物共计22040件，其中龙泉窑青瓷就有12377件，约占总数的56.2%，且质量上乘^[12]。主要有佛教与陈设类器、文房用器、茶酒器、日常用瓷等^[13]。14世纪初，在杭州净慈寺学习的中岩圆月在《谢惠青器香炉并序》中说：“窑瓷精致何处来，括苍所产良可爱。”^[14]从这些事例都可以看出，虽然日人购销龙泉窑瓷器之初心可能与筹措资金等有关，但不能抹杀其对龙泉青瓷的欣赏和喜爱。

可以说，从元代开始，龙泉窑瓷器的外销产量大幅增加，深得各国人民喜爱，并迅速渗入当地人们的文化、生活和宗教等领域，从而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外商还根据本国的生活习俗和民族特色，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要求，订购所需瓷器；我国许多窑场也适应西方市场的需要，生产专供外销的产品，从而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外销瓷，其中尤以龙泉窑最为突出。据考古调查，龙泉窑窑场在元代数量猛增，密集分布于瓯江上游的龙泉溪以及支流两岸的龙泉、云和、遂昌、丽水、青田、永嘉、

文成、泰顺、苍南等地。元代的窑址总数达400多处，占总窑址数量的80%以上。而且从窑场分布的情况来看，从瓯江上游的龙泉南区渐渐向中游的东区发展，也是为了运输便利，所以这种兴盛情况肯定与大量外销有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0年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已发现的龙泉东区218处窑址中，属宋代的26处，宋至元时期的6处，宋至明时期的3处，元代115处，元至明时期的46处，明代22处，显而易见元代窑址占绝大多数^[15]；而庆元县境内，元代时龙泉窑生产广泛，还扩展到竹口窑址群的枫堂、竹口一带。

三、天下龙泉：明代龙泉窑的技术输出

到了明初，朝贡是唯一形式的海外贸易政策，不允许中外商人随便进行贸易。吴元年（1364年），朱元璋在太仓、黄渡设立市舶司，洪武三年（1370年）停罢，改设于宁波、泉州和广州^[16]。这三者都有规定的贸易对象，《明史·食货志》载：“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17]而朝贡贸易之贡期、船数、人数及贡品等均有明确规定，如永乐初年“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18]。宣德初，规定人员数量不能超过300，船不能超过三艘。为防止私人非法贸易和海盗冒名走私，还有严厉的法律制裁，洪武四年（1371年）“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19]；洪武二十七年诏“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20]。不过琉球、占城等的朝贡贸易并不受此限。

由于实行海禁政策，龙泉窑瓷器的生产和销售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从窑址调查的情况看，明代只有130处左右的窑场还在继续生产，特别是中期以后，其核心生产区也从龙泉的大窑转移到了庆元的竹口一带。《龙泉县志》更有“化治以后，质粗色恶”^[21]的判定。但外部对龙泉窑产品的需求自元以来一直非常旺盛，“嗜利忘禁，私下诸蕃，贸易香货”的事屡有发生。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中国金、银、铜钱、缎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

货物，故严禁之。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22]，尽管没有提及瓷器，但“私易货物”中少不了瓷器，特别是龙泉窑瓷器。永乐二年（1404年）琉球国山南王的使臣，“私赍白金诣处州市磁器，事发，当论罪。帝曰：‘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悉贯之”^[23]。明确是私自买卖龙泉窑青瓷。除了东洋人，还有西洋人也出没于浙江沿海“私易货物”。弘治十三年（1500年）“夷人朝贡到京，例许贸易五日。有司拘集铺行，令将带不系违禁货物，两平交易。若原来送及馆夫、通事人等，引领各夷潜入人家，私相交易者，没入价值私货”^[24]。可能在嘉靖三年（1524年）后就有少数葡萄牙人前来浙江双屿岛进行贸易^[25]。“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邓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狱。嘉靖丙戌越狱遁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托合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交易。”^[26]这里的“番夷”应包括了葡萄牙人，虽然其时他们是“系泊双屿等港，私通罔利”，“每年夏季而来，望冬而去”，并未构筑巢穴。至嘉靖十九年（1540年），徽州私商许松等人到满刺加，招引大批葡萄牙人至浙江沿海贸易，共同占据双屿，双屿的葡萄牙居留地逐渐形成。故突破海禁的情况，自该政策制定以来便常有出现，违禁情节的多样化、剧烈化，反映出当时走私贸易相当猖獗。而走私商人之所以甘冒风险，不惜与官军对抗，应是受到巨额利润的诱惑。不过“番夷”到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龙泉窑的销售区域从伊斯兰文化圈扩展到了基督教文化圈。

如何解决外部的大量需求与国内海禁政策这一对尖锐矛盾？除了少量的朝贡贸易，“私下诸蕃”肯定也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对策。北京大学和肯尼亚国立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2010—2013年间调查了肯尼亚沿海地区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发现明代初期龙泉窑瓷器的数量仍然较大。

当然，“私下诸蕃”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事，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矛盾。且龙泉窑原产地

的窑场因“利微而课额不减，民甚病焉”，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部分龙泉的窑场和窑工为了生计，慢慢将生产转移到了当时管控较松的粤东、闽南地区。福建、广东地区生产龙泉青瓷风格的窑址，已进行了初步的考古调查，如惠州白马山窑、新庵镇窑、大埔余里窑^[27]及珠海、河源、潮州、揭西等地约五十处窑址，个别窑场也进行了发掘。这些窑场主要兴盛于明代，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是伴随着龙泉窑核心生产区的衰落而兴起的，应与当时瓷器外销政策及贸易线路和主要港口的变化休戚相关。这不单是先进的制瓷技术对周围地区窑业生产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应有核心技术直接转移。

同时，类似的技术输出还存在于东亚、东南亚，更有甚者远至西亚的伊朗、叙利亚，北非的埃及等地。以东南亚一带的越南、泰国为例，除了龙泉青瓷外，当地还出土或出水了相当数量的仿烧龙泉青瓷，其产品从造型到装烧工艺，甚至包括细节处理，都与龙泉青瓷别无二致。在越南北河府安越县的一个窑场之中有一块碑上刻着“滨陶舜器”字样，与龙泉窑特有的“河滨遗范”字款具有相似的内涵与意义^[28]。所以，种种证据都表明，当时必定有原在龙泉烧造瓷器的窑工迁徙到越南，并利用当地的资源继续生产相似的瓷器。总体来看，明时期的龙泉窑虽然存在产品输出，但更多的还是技术输出。从伊斯兰地区对龙泉瓷器的模仿^[29]、14—15世纪东南亚地区（越南、泰国、缅甸等）仿龙泉的窑场和产品、17世纪日本有田瓷器对龙泉窑的模仿^[30]（特别是锅岛烧对明初龙泉官器的模仿）等现象来看，当时形成了“天下龙泉”的大势，龙泉窑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元代龙泉窑产品的一统天下，到明代全球仿烧龙泉窑风格产品的风行，“天下龙泉”大势形成，既可以看出龙泉窑自身的魅力，也可看出其输出形式从产品输出向技术输出的被迫转变。

注释

- [1]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市舶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13—4214、4216页。
- [2]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第4538页。
- [3] E. Edwards McKinnon: Ancient Shipwrecks in Indonesian Waters: The Ceramics Cargoes, Himpunan Keramik Indonesia/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200.
- [4] 冯承钧撰:《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
- [5] 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
- [6] 《元史·食货志》:“互市之法,自汉通南粤始,其后历代皆尝行之,至宋置市舶司于浙、广之地,以通诸蕃货易,则其制为益详矣。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大抵皆因宋旧制而为之法焉。于是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明)宋濂撰:《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6年,第2401页。
- [7] (明)宋濂撰:《元史》九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6年,第2402页。
- [8] 项坤鹏:《浅析东南亚地区出土(水)的龙泉青瓷——遗址概况、分期及相关问题分析》,《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
- [9] (元)汪大渊著,苏继庾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
- [10] (元)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中华书局,1981年,第148页。
- [11] 李军:《元代庆元港与龙泉窑青瓷外销》,《龙泉窑瓷器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93—104页。
- [12] [韩]高美京:《新安船出水陶瓷器研究述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
- [13] 李德金、蒋忠义、关甲堃:《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 [14] [日]中岩圆月:《东海一沤集·谢惠青器香炉并序》,《大日本史料》第6册43编,永和元年1月8日条,第83页。
-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 [16]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五《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8页。
- [17]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0页。
- [18]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二二《外国传·日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47页。
- [19]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中华书局,1977年,第840页。
- [20]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影印,第3374页。
- [21] 《龙泉县志》卷三《赋役志·物产》,乾隆二十七年修,同治二年补刊本。
- [22]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五《洪武二十三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影印,第3067页。
- [23]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二三《外国传·琉球》,中华书局,1974年,第8363页。
- [24] 《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九《弘治十三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影印,第2859页。
- [25] 嘉靖二十七年(1549年),“海寇勾引各夷占据双屿,相传二十余年”。(明)朱纨:《鹭余杂集·哨报夷船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88页。“自甲申岁凶,双屿货壅,而日本贡使适至,海商遂贩货以随售,倩倭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西洋船原回私澳,东洋船遍布海洋而向之商舶悉变而为寇舶矣。”(明)邓钟:《筹海重编·经略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7册,齐鲁书社,1999年,第200页。
- [26] 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海世》,1939年影印本,第2页。
- [27] 曾广亿:《广东惠阳白马山古瓷窑调查记》,《考古》1962年第8期;曾广亿:《广东惠阳新庵三村古瓷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4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客家博物馆、大埔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广东大埔余里明代窑址2013~201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10期。
- [28] 沈岳明:《河滨遗范 天下龙泉》,《世界遗产》2016年第6期。“滨陶舜器”铭文是笔者访学越南时亲眼所见,其模仿龙泉窑特有的“河滨遗范”款,应是为宣扬本地仿烧的与龙泉极为相似的青瓷,也可说明龙泉烧造瓷器的窑工曾经来到这里。
- [29] [英]奈杰尔·武德、[英]克里斯·多赫蒂著,闻雯译:《十三至十五世纪伊斯兰地区对龙泉青瓷的仿制》,《紫禁城》2019年第7期。
- [30] [日]森达也著,胡一超译:《中国青瓷对日本陶瓷的影响》,《紫禁城》2019年第7期。